

小說軒

公案小說漫話

張國風著

江蘇古籍出版社 中華書局(香港)

11014
17
2:4

張國風 著

公案小說漫話

062256

江蘇古籍出版社
中華書局(香港)



女子学院 0026154

(蘇)新登字006號

小說軒

主編：劉逸生
策劃：鍾潔雄

書名：公案小說漫話
著者：張國風
出版：江蘇古籍出版社
合作出版者：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發行：江蘇省新華書店
印刷：愛德印刷有限公司

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
ISBN 7-80519-349-5/1·86 定價：5.30元

關於“小說軒”的幾句閒話

我常覺得，不管是在學的還是自學的青少年，假如他對中國古典文學、古代文化有興趣的話，一定也會對中國的古典小說感到興趣。因為從六朝志怪、唐宋傳奇直到明清小說，上下一千五百年間，無數文人都曾在這方面灑下過他的心血，也因而積累了巨大的文化財富。在這裏面，涉及的內容是非常廣泛的，反映的社會情態是非常複雜的，故事的情節千奇百怪，運用的語言文字多姿多采；從那裏面，可以看到不同時代不同的思想形態、感情內容、風俗習慣、社會心理、宗教信仰……生動而又具體。假如說，正史和通史只能畫出球體的經線和緯線，那麼，小說就是球體的本身。難怪恩格斯高度讚揚巴爾扎克的《人間喜劇》，說：“在這個中心圖畫的四周，~~他安置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，從這個歷史裏，甚至在經濟的細節上~~，我所學到的東西也比從當時所有專門歷史家、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的全部著作合攏起來所學到的還要多。”

我也很欣賞金聖嘆這段話：“吾猶自記十一歲讀《水滸》後，便有於書無所不窺……嗟乎！人生十歲，耳

目漸吐，如日在東，光明發揮。如此書，吾即欲禁汝不見，亦豈可得。今知不可相禁，而反出其舊所批釋，脫然授之於手也，夫固以爲《水滸》之文精嚴，讀之即得讀一切書之法也。汝真能善得此法，而明年經業既畢，便以之遍讀天下之書，其易果如破竹也……”

我同樣欣賞晚清孫寶瑄《忘山廬日記》裏面的這段話：“燕公謂：小兒教之讀書通文，自有捷徑。自言其女十歲時，尚不識字，十一歲起課以《十三經集字》，日識四十字，兼爲解字義，半年已能自閱《三國演義》（說部最佳書），即爲講《左傳》，使讀，不令背誦，甫讀完，能成數百言。嗣爲解《國語》及《史記菁華錄》，三書訖，能自覽御批《通鑑》。可知中國文理得善法教之，更不難。”

隨手舉這三例，都是經驗之談。可見不管是了解社會，還是要進入文藝殿堂，小說這個階梯都是非常重要的。

中國向有評點小說這一門。其源蓋起於評點古人詩文以及時文，進而泛濫及於小說。此風以明末清初最盛，後頗衰落，雖餘風不斷，而佳構頗鮮。自金聖嘆以後，毛宗尚尚可一觀；至於《紅樓夢》的脂批，僅可作探幽索隱的材料，護花主人之流，便已俗不可耐；馮鎮憲、但明倫也批《聊齋》，能發人神智者亦極少；還有一些道士、居士，以《西遊記》爲“證道之書”，他們的批語更是近於胡鬧。可見評點小說，雖曰“小道”，也大有“才難”之嘆。近數十年，考證小說之學崛興，胡適之、鄭振鐸、孫楷第、

阿英諸公，各有擅長，已脫離評點，而繼乾嘉諸老之後開一新的門徑，是另外一門學問了。至於就一本小說作思想性、藝術性評論的，自王國維《紅樓夢評論》以來，長篇短章，琳瑯滿目，但也不屬於評點。這門學問，說深不深，說淺不淺，如今還沒有一個“金聖嘆二世”出現，不禁使人有“江山寂寥”之感。

然而，除了評點、考證、評論，似乎還可以有第四種形式，即所謂“漫話式”的。本世紀四十年代，由孟超撰文、張光宇插圖的《水泊梁山英雄譜》，是這一方面的力作。其好處就在於“漫”。“漫”也者，似不經心而實經心，似非着力而又着力，似諧而莊，笑中有淚，“正經學問”外又一獨立王國也。畫之有“漫”，話之有“漫”，詩之有“打油”，樂曲之有“狂想”，戲劇之有“插科打諢”，武術之有“猴拳”、“醉拳”，凡此種種，無不是的。若著述之“漫”，則又縱橫開闊，無格可循。換言之，古典小說的漫話，既非金聖嘆式的評點，而又具有評點的趣味；絕非胡適之式的考證，而又帶上考證的深度；不同於王國維式的評論，而又處處顯出評論的力量。按人物之頭顱而製帽，視事件之是非而予奪，有《春秋》之微言，無腐儒之膠柱，淺者自見其淺，而深者則見其深。至於文字形式，則更不拘一格，謂之小品也可，謂之“野狐禪”亦可，或如師友晤對，或似書札往來，平凡之中，偶有警語，閒扯之際，忽現閃光：此便是所謂“漫話”。一千五百年間，

中國出現的小說多矣，但是，對其漫而談之的著作，却似鳳毛麟角，少而又少。如今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出版部的主編，忽發宏願，有“中國古典小說漫話”的擬題，而美其名曰“小說軒”，我想這是一件大好事。論其形式與內容，實在不妨稱之為“小說的小說”，蓋“小說”者，異於正史者也；這裏的後一個“小說”，則又異於評點、考證、評論者也。因其為“小”，可以易於涉趣，也易於入目；因其為“小”，亦可避免“正襟危坐”，作出“純儒”的姿態。這也是小有小的好處。說到有無價值，本也難說，但它若對青少年的讀書求知有啓迪之用，對成人來說，有增廣見聞之功，只這兩項，就足見其並非毫無價值了。至於在將來的小說界，是不是於評點、考證、評論之外，更能立一新的部目，如一張桌子之有四條腿呢？我們何妨拭目而俟之。

這算是一點閒話而已。

劉逸生

寫於羊城的寓廬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

目 錄

“公案”的名與實.....	1
公案小說不是偵探小說.....	7
包公的“法治”學不得.....	10
煞風景的考證.....	15
天下小說一大抄.....	20
深入人心的復仇主義.....	25
役賤而任重的人——忤作.....	30
敬鬼神而用之.....	35
古代司法制度生出的怪胎——訟師.....	39
衙役出身的好漢.....	45
衙蠹損官聲.....	50
明代的“法制文學”（上）.....	57
明代的“法制文學”（下）.....	65
文言公案小說的傑作.....	73
“微服私訪”的成效.....	78
書呆子、小機靈和“誑嘴吃的”.....	82
身後的“不幸”.....	88
棰楚之下.....	92
名分與法律.....	98
從《錯斬崔寧》談起.....	103
宮怨與公案.....	107

賭博心理學.....	112
真是人間第一偷.....	118
清官的可怕.....	123
公案文學的絕好素材 ——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.....	129

“公案”的名與實

人有個習慣，每遇到一個事物，就琢磨着給它起個名字。這好像是上帝賜給人類的一種權利。歷朝的法律對人們這種命名的權利都沒有太多的限制。命名既有極大的自由，極大的隨意性，那麼，同一事物的命名便會因時因地因人而有所不同。人對事物的認識總是需要一個過程。事物本身也是不斷變化的，語言的內涵與外延都具有伸縮的可能。天長日久，名與實的關係變得錯綜複雜。很多事物的命名，在當時人看來很容易理解，而後人則可能會覺得莫名其妙。有名無實、有實無名、名存實亡、名實皆亡，張冠李戴，種種情況都有。研究古代文化的人常常會更多地遇到這種名不符實的情況。本書是漫話公案小說，也還必須從清理“公案小說”這個概念開始。

“公案”是宋元話本的分類之一。在宋元話本的各個分類名稱中，“公案”一類的含義似乎是最不成問題的。所以，“公案”的

含義一直未能得到深入的探討。

按常情推測，“公案”作為一種人們普遍接受的話本分類名稱，它的含義與當時人對於“公案”一詞的一般理解不可能相距太遠。宋元時，“公案”一詞有如下五種含義：

一指官府的案牘。

宋蘇軾《東坡集·奏議集十三·辨黃慶基彈劾劄子》：“今來公案，見在戶部，可以取索按驗。”

宋洪邁《容齋隨筆卷四·張浮休書》：“公曰：‘不然。吾子皆時才，異日臨事，當自知之。……無以遺日，因取架閣陳年公案，反覆觀之，見其枉直乖錯，不可勝數。……’”

一指案件。

宋人話本小說《錯斬崔寧》：“府尹也巴不得了結這段公案。”

宋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卷八：“乃知范公所言者，楊嗣復等公案耳。”

一指官吏審案時所用的桌

子。

《元曲選·陳州糶米》四：
“快把公案打掃的乾淨，大人敢待來也。”

一指禪宗用教理解決疑難問題，如官府判案。

宋釋圓悟《碧巖錄十·九八學》：“劈腹剜心，人皆喚作兩重公案。”

一指話本小說的一類。

宋耐得翁《都城紀勝·瓦舍衆伎》：“說話有四家。一者小說，謂之銀字兒，如烟粉、靈怪、傳奇、說公案，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迹變泰之事。”“凡傀儡敷衍烟粉、靈怪故事、鐵騎、公案之類。其話本或如雜劇，或如崖詞。大抵多虛少實。”

宋吳自牧《夢粱錄·百戲伎藝》：“凡傀儡、敷衍烟粉、靈怪、鐵騎、公案、史書、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，或講史，或作雜劇，或如崖詞。”《夢粱錄·小說講經史》：“說話者，謂之舌辯。雖有四家數，各有門庭。且小說名‘銀字兒’，如烟粉、靈怪、傳奇、公案，朴刀桿棒發發踪參之事。”

宋羅熾《醉翁談錄·舌耕叙引》：“有靈怪、烟粉、傳奇、

等及女占賈關索等三娘黑四姐女衆俱瓦市諸鄧等
勝以爲雄偉耳

小說講經史
說話者謂之舌辯雖有四家數各有門庭且小說名銀
字兒如烟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桿棒發發踪參之事
有譚淡子翁三郎雍燕王保義陳良策郎婦東兒余
二郎等談論古今如水之流談經者謂演說佛書說參
請者謂賓主參禮俗事有賣庵管庵喜然和尚等
又有說謠經者戴忻庵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

南宋吳自牧撰的《夢粱錄》
把“公案”當作話本小說的一類

公案、兼朴刀、桿棒、妖術、神仙。自然使席上風生，不枉教座間星拱。”“言《石頭孫立》、《美女尋夫》、《憂小十》、《驢染兒》、《大燒燈》、《商氏兒》、《三現身》、《火杖籠》、《八角井》、《樂巴子》、《獨行虎》、《鐵秤鉗》、《河沙院》、《戴嗣宗》、《大朝國寺》、《聖手二郎》，此乃謂之公案。”

我們不妨撇開“公案”一詞的原始含義，也不問它的各種含義孰先孰後的問題，只看宋人、

元人的常見用法。顯然，宋元間“公案”一詞的中心含義是“案件”，其他各種含義均圍繞在這一中心含義的周圍。公案小說作為宋元話本小說的一個門類，正是指那種取材於各種案件的小說。所謂“各種案件”指的是各種民事糾紛和刑事案件。“公案”作為話本小說的分類名稱，是從它所取素材的特點而來的。

這裏有必要糾正兩個頗為流行的觀念。公案小說是寫斷獄審案的，這是其一。公案小說十之八九以清官為主角，這是其二。說公案小說寫斷獄審案似乎沒大錯，可是，這種說法容易導致誤會。人們會以為它寫的是如何破案。這就把公案小說的範圍理解得很窄。其實，公案小說常常不是把重點放在破案上，重點是寫案件本身所反映的社會生活。在公案小說名篇《錯斬崔寧》、《簡帖僧巧騙皇甫妻》中，破案本身都沒有什麼曲折和趣味，只是案子中反映的生活有趣味。《包公案》倒是寫了一百個包公破案的故事，不是旋風來引路，就是冤魂來托夢顯靈。至於說公案小說十之八九以清官為主角，那是經不起推敲，是從形式上看問題。

《錯斬崔寧》、《簡帖僧巧騙皇甫妻》中的法官給人留下了什麼印象呢？《包公案》中的包公，他在小說中的實際作用就是將很多案件串連在一起。《三俠五義》中的包公有了較全面的、連續的描寫。可是，即使是在《三俠五義》中，包公也始終沒有佔據主角的地位。當作者將筆墨轉向那些俠客的時候，包公的作用依然降低為一個穿針引線的配角。關於南俠、北俠、五鼠、丁氏雙俠的故事，都靠開封府的包公串連到了一起。

現代人之所以對古代公案小說形成這樣的誤解，是因為人們的頭腦中先有了現代偵探小說的概念。現代偵探小說主要寫偵破，主角是偵探。而公案小說也要寫到破案，於是，人們就認定公案小說以斷獄審案為主要描寫對象，而小說的主角自然就是破案的主體——清官了。

用流行的公案小說概念去研究宋元間的公案小說，便會陷入十分尷尬的境地：宋人羅列的公案小說名目中，常常沒有什麼公案小說的意味。《醉翁談錄》的“舌耕筆引”中羅列了十六篇公案小說。據專家考證，這十六篇

作品中，只有《三現身》、《聖手二郎》很可能是公案小說。因為《警世通言》中有一篇《三現身包龍圖斷冤》，《醒世恆言》中有一篇《勘皮靴單證二郎神》。令人迷惑的是《姜女尋夫》這樣的作品也列入了公案小說。《姜女尋夫》一篇，大家都認為是講孟姜女的故事，好像很難與公案掛鉤。只能這樣去解釋：當時小說的分類，不一定那麼嚴格準確。按題材來給小說分類，本身就有 many 困難。如果說《石頭孫立》、《戴宗》指的就是《水滸傳》中的孫立、戴宗；那麼，按照公案小說即是取材於案件的小說的概念，就完全可以理解。雖然孫立、戴宗的故事不屬於斷獄審案一類，可是，孫立、戴宗的故事，確有觸及刑法、驚官動府的內容。歸入公案，亦在情理之中。《都城紀勝》中說的“說公案，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迹變泰之事”，正是作如此理解。

陳汝衡在《說書史話》中對“公案”提出了這樣的解釋：

公案、鐵騎兒被列在武的故事固然不錯，但這裏的“武”，却不一定專指戰爭。所謂“朴刀棍棒”，是泛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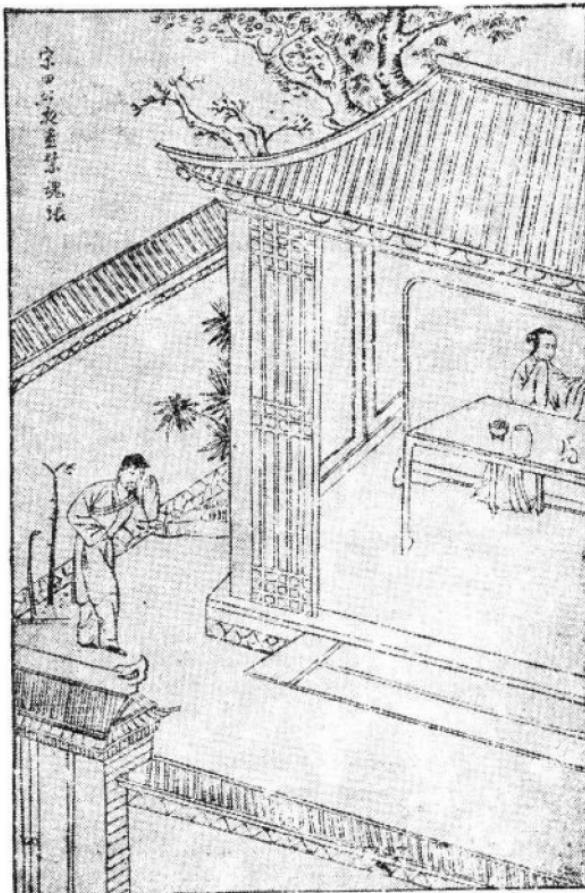
江湖亡命，殺人報仇，造成血案，以致經官動府一類的故事。再如強梁惡霸，犯案彙聚，貪官贓吏，橫行不法，當有俠盜人物，路見不平，用暴力方式，替人民痛痛快快地伸冤雪恨，也是公案故事。總之公案項下的題材，決不可以把它局限在戰爭範圍以內，凡有“武”的行動，足以成為統治階級官府勘察審問對象的，都可以說是公案故事。

陳汝衡在這裏對“公案小說”的概念作了比較寬泛的解釋與理解，這種寬泛的解釋與理解比較符合古代公案小說的實際。陳汝衡的公案小說概念十分接近今日所謂“法制文學”。“法制文學”多寫民事糾紛，刑事案件，從中反映社會、反映人生。“法制文學”也都是通俗文學，它的對象是一般的民衆。陳汝衡的解釋不但解決了公案小說的內容何以如此龐雜的問題，而且啟發我們重新看待公案與俠義合流的問題。

一般人認為到了清代中葉，俠義與公案漸漸合流，而《施公案》便代表著這一合流的開始。可是，按照陳汝衡的公案小說概

念，便會發現公案與俠義的合流早已濫觴於唐代傳奇，以後則不絕如縷，從未中斷。唐人傳奇中的《虬髯客傳》、《紅綾傳》、《崑崙奴傳》等作品，寫的是俠

義人物，但與此同時，也未嘗不可以視為“驚官動府”、“足以成為統治階級官府勘察審問對象的”公案故事。宋元的公案小說中，時常可以發現俠義人物的身



《宋四公大鬧禁魂張》是結合公案與俠義的典型作品

062256

影。《醉翁談錄》的“小說引子”中提到“也說趙正激惱京師”。這趙正就是《古今小說》中《宋四公大鬧禁魂張》裏的趙正。這是一篇公案與俠義合而為一的典型作品。慳吝刻薄的張員外欺負一個窮漢，引起宋四公抱不平，晚上去張員外家土庫，“覓了他五萬貫錢贓物，都是上等金珠”。接着又寫趙正，本領更在宋四公之上。偷了錢大王的玉帶，剪了緝捕使臣馬翰的衣袖，割了滕大尹的腰帶撻尾，攬得東京城裏沸沸揚揚。誰能說這不是公案，誰能說這不是俠義呢？明代小說中，公案與俠義的合流就更普遍了。一部《水滸傳》，處處都涉及公

案，回回都寫到俠義。魯提轄拳打鎮關西、大鬧野豬林，武松醉打蔣門神、血濺鴛鴦樓，不都是公案而兼俠義嗎？《水滸傳》的興趣不在斷獄審案，而在英雄的傳奇故事，可是，江湖亡命，劫富濟貧，動輒“驚官動府”，幹的是“滅九族的勾當”，說是公案，毫無問題。所以，公案與俠義的合流不必等到清中葉的《施公案》。

從公案小說的取材範圍、描繪的重點、作者的興趣所在，以及公案小說的結構來看，公案小說都接近今日所謂“法制文學”，而不是所謂“偵探文學”。



公案小說不是偵探小說

一提起公案小說，人們便很容易聯想起現代的偵探小說，如世界聞名的《福爾摩斯探案》。在各種文學史的著作上，也都寫着，公案小說寫的是斷獄審案的故事。然而，只要稍微讀過一點公案小說的人都會發現，古代的公案小說與現代的偵探小說，儘管題材都是涉及刑法的故事，可是，古人和今人對題材的處理完全不同。

現代的偵探小說，懸念設在“破”字上。罪犯放在暗處，時隱時顯，而將破案者放在明處。讀者的思路順着破案者的思路走。作者總是要盡量把故事編得曲折離奇，案情寫得真真假假，撲朔迷離。到了結尾，才點明真正的作案者，解釋案件的來龍去脈，解開所有的疑團。以達到出人意料之外、又在情理之中的最佳的效果。

古代的公案小說也寫破案，可是，小說的懸念一般不是繫在破案上，而是繫在人物的命運上。

作者常常把作案者放在明處，讀者對於案情的來龍去脈，對於誰是真正的罪犯，一清二楚。“笑笑主人”為《今古奇觀》所作的序中讚譽馮夢龍編著的“三言”“極摹人情世態之歧，備寫悲歡離合之致”。所謂“人情世態”、“悲歡離合”，正是中國古典小說注重描寫的地方，也是公案小說着力描寫的地方。

公案小說中的成功之作，往往不是突出破案者的智慧，而是因為人情世態寫得真切、悲歡離合寫得動人，抓住了讀者。例如，《醒世恒言》中的公案小說名篇《十五貫戲言成巧禍》（即《錯斬崔寧》），就把罪犯放在明處來寫。案情的底細，讀者瞭如指掌。不僅如此，作者還忍不住站出來解釋劇情、發表議論：

看官聽說，這段公事，果然是小娘子與那崔寧謀財害命的時節，他兩人須連夜逃走他方，怎的又去鄰舍人家借宿一宵？明早又走到爹

娘家去，却被人捉住了？這段冤枉，仔細可以推詳出來。誰想問官糊塗，只圖了事，不想捶楚之下，何求不得。……所以做官的，切不可率意斷獄，任情用刑，也要求個公平明允。道不得個死者不可復生，斷者不可復續，可勝嘆哉！

崔寧、陳二姐冤死以後，劉貴的妻子被靜山大王抓去，做了押寨夫人。有一次，靜山大王無意中洩露了當年殺害劉貴、掠得十五貫錢的秘密。劉貴的妻子聽了，心中暗暗叫苦，“明日捉個空，便一逕到臨安府前，叫起屈來”。於是，真相大白，崔寧與陳二姐的沉冤得以昭雪。這裏沒用到福爾摩斯，連包公也沒用上。在另一篇公案名作《簡帖僧巧騙皇甫妻》中，同樣沒有去突出破案者的智慧。這個和尚與靜山大王一樣，他自己得意地向騙來的妻子透露了當年設局謀騙的經過。“婦人聽得說，摔住那漢叫聲屈，不知高低。”和尚見勢不好，就要“壞他性命”。恰好皇殿直趕到，“即時把這漢來捉了，解到開封府錢大尹廳下”。在這篇小說中，法官只是陪襯，不給人留下一點



《簡帖僧巧騙皇甫妻》是公案小說的名篇

印象。上述兩篇公案小說中，主要是用人物的命運來抓住讀者。

“十五貫”、“簡帖僧”兩案都輕而易舉地破了，甚至沒有費官府一點力氣。可是，作品却並沒有因此而失去它的魅力。這種公案小說的魅力不在於用懸念去吸引讀者，而是用公案中展開的人情世態的準確描繪、人物的悲歡離合的命運來抓住讀者。作品沒有設置尋找罪犯的懸念，但人物的冤屈牽動着讀者的心弦。